



铜仁路的肠汤线粉摊

贺友直 图/文

这肠汤线粉摊的东西干净道地，最低价的虽只有肠、线粉，但不减量缺料，至于二角五分之一碗的“全家福”，是肠、肚、心、肺齐全，以致有的食客在南阳路口的糟坊里拎只小酒壶配上一碗全家福，享受一顿既美又能微醺的早餐，何其乐胃乃耳。

这个摊头还有一个长处——干净。他做的猪肠毫无腥气。并在洗碗水的锅里装上盘香管，利用炉火余热烧水洗碗。摆一个吃食摊如此用心可算得上敬业了。这摆摊的，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？是落脚在上海的外地人，像我这样在上海住了七十几年的仍是个来自宁波的外地人。问题是当年那些“外地人”做这种小生意的人对经营的东西那么认真讲究并持之以恒，而今却是好不了两天就走样了，这是为何？

1958年4月上旬，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，准备参加即将在台召开的院士会议和进行院士选举。《胡适年谱》4月9日记载：“下午，蒋介石在官邸接见胡适。事后他（胡适）对记者说：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，当可将未完成的著作《中国思想史》写完，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《中国思想史》，接着就要写《中国白话文学史》下册。”可见胡适这次回台，挂念的还是学术大事。次日上午九时，胡适就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，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，蒋介石请他出任此职，他“曾几次托人恳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究机构，所以就应该担负起“复兴民族文化”的任务”。蒋还说，伦理道德实为吾人复兴民族、治标治本之基础。胡适针对蒋希望“恢复并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与道德”的认识，表示，“我们的任务，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，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，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，所有一切高等文化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伦理学说，都是人类共同有的”。在履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期间，胡适除因病

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，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。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：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，我所谓

的打倒，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、神秘性，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，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、批评的，我都要打倒。胡适的“反弹”使蒋很不悦。多年后，学者潘光哲在《问妨是书生》一书中写道：当年蒋、胡那番言语交锋，蒋介石认为“中央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究机构，所以就应该担负起“复兴民族文化”的任务”。蒋还说，伦理道德实为吾人复兴民族、治标治本之基础。胡适针对蒋希望“恢复并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与道德”的认识，表示，“我们的任务，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，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，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，所有一切高等文化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伦理学说，都是人类共同有的”。在履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期间，胡适除因病

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，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。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：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，我所谓

的打倒，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、神秘性，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，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、批评的，我都要打倒。胡适的“反弹”使蒋很不悦。多年后，学者潘光哲在《问妨是书生》一书中写道：当年蒋、胡那番言语交锋，蒋介石认为“中央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究机构，所以就应该担负起“复兴民族文化”的任务”。蒋还说，伦理道德实为吾人复兴民族、治标治本之基础。胡适针对蒋希望“恢复并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与道德”的认识，表示，“我们的任务，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，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，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，所有一切高等文化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伦理学说，都是人类共同有的”。在履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期间，胡适除因病

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，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。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：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，我所谓

的打倒，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、神秘性，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，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、批评的，我都要打倒。胡适的“反弹”使蒋很不悦。多年后，学者潘光哲在《问妨是书生》一书中写道：当年蒋、胡那番言语交锋，蒋介石认为“中央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究机构，所以就应该担负起“复兴民族文化”的任务”。蒋还说，伦理道德实为吾人复兴民族、治标治本之基础。胡适针对蒋希望“恢复并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与道德”的认识，表示，“我们的任务，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，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，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，所有一切高等文化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伦理学说，都是人类共同有的”。在履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期间，胡适除因病

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，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。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：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，我所谓

的打倒，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、神秘性，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，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、批评的，我都要打倒。胡适的“反弹”使蒋很不悦。多年后，学者潘光哲在《问妨是书生》一书中写道：当年蒋、胡那番言语交锋，蒋介石认为“中央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究机构，所以就应该担负起“复兴民族文化”的任务”。蒋还说，伦理道德实为吾人复兴民族、治标治本之基础。胡适针对蒋希望“恢复并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与道德”的认识，表示，“我们的任务，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，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，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，所有一切高等文化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伦理学说，都是人类共同有的”。在履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期间，胡适除因病

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，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。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：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，我所谓

的打倒，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、神秘性，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，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、批评的，我都要打倒。胡适的“反弹”使蒋很不悦。多年后，学者潘光哲在《问妨是书生》一书中写道：当年蒋、胡那番言语交锋，蒋介石认为“中央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究机构，所以就应该担负起“复兴民族文化”的任务”。蒋还说，伦理道德实为吾人复兴民族、治标治本之基础。胡适针对蒋希望“恢复并发扬中华固有文化与道德”的认识，表示，“我们的任务，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，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，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，所有一切高等文化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伦理学说，都是人类共同有的”。在履职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期间，胡适除因病

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，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。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：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，我所谓

的打倒，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、神秘性，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，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、批评的，我都要打倒。胡适的“反弹”使蒋很不悦。多年后，学者潘光哲在《问妨是书生》一书中写道：当年蒋、胡那番言语交锋，蒋介石认为“中央研究院”是学术之最高研

我忽然在想，我算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

按照传统习惯，我父亲姓任，我也姓任，我父亲是广东鹤山人，我自然也是广东鹤山人。我的户口簿、履历表上都这么写。我生在上海，家里说的是广州话，烧的是广东风味的菜，来往的亲戚是广东同乡，真正是在上海的广东人家。我五岁回广州，只说广州话，只吃广东菜，一下子成了地道的小广东。暑假我回家乡，是父亲出生的家乡，学会说不同于广州话的广东鹤山旺宅村方言，有两次清明节还跟着叔伯到远处给大太公扫墓，据说他们是最先从他处落籍到此地来。这样去扫墓的，还分给我们这些子孙猪肉。

可见我是地道的广东人。我也深为做一个广东人而自豪。我会几种方言，而说得最地道的是广州话，我的广州话是广州西关话，虽然我前些年到广州，他们说我的广州话虽然说得实在好，只是太老式了一点。广州话会有古音，它为我后来学语言学，学日语等带来方便。

台湾朋友来信，说到美丽花莲最近面临的问题。大陆客人潮汹涌，很多是零团费的旅游团。花莲开山修路，围海造赛车场，豪华度假村、大饭店在青山绿水间拔地而起。朋友痛心又茫然，花莲的原生态景观很快就复存在，到底是谁的责任？

我赞同这样的旅游理念：游客要尊重所游之地的一切——土地、山水、原住民的生活，包括走远路、爬高山、设施缺乏等等。

最近，我去了福建泰宁和武夷山。那么一个偏僻小山城，竟然出了2个状元，50多个进士。当地有进士巷、举人街，保留下了的那几幢明代的民居，是我所见到的最高大壮观的民居。那个地方，宋明时代一定是读书蔚然成风，读书人成堆。那些老街，虽然破败不堪，但是，干干净净，看不到中国其他小城镇那样的肮脏杂乱和喧闹。居民至今保持浓厚的民风，看上去彬彬有礼。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个叫泰宁的地方。可能也就是因为它的默默无闻，那些无形的东西才得以保留。

叔叔洗衣服、拉电线很辛苦，我们也应该向你们学习。”下面的落款是：几个少先队员。顿时，我的心头一热，不仅是被小观众们们的行为深深感动，更感到当一名儿童剧演员的自豪！

1963年，我们又演出了《共产

主义展示雷锋》这个戏。演出那天后台化妆时天气还挺好，晚上等演出结束后，剧场外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所有演职人员几乎都被这场大雨困在后台，回不了家。在六十年代是没有出租车的，更不会有如今的私家车了。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，突然，楼下有同事大声呼叫：“顾帼一有人找你！”我想，那么晚了，还下着倾盆大雨，有谁会来找我呀？下楼到门外一看，只见两个小观众正打着伞，站在雨中，一个孩子手上拿着雨伞，另一个则提着双套鞋。她俩说：“阿姨，这么大雨，我们给你送伞和套鞋来了。我们是你的观众。”天哪！我万万没想到！多么质朴的语言，多么可爱的小

观众啊！我立刻明白了，那是因为我们

在演出中，有一场雷锋打着伞，雨中送大婶的戏，孩子们看完演出，立刻行动起来！

看到这些可爱的小观众，我感到做一名儿童剧演员真幸福！我的脚腕、我的腿、我的腰都在演出中受过大大小小的伤。如今我的腰里还放着两个钉子。儿艺的演员是成了名的，孩子们只会记住你是甘罗、猫儿眼、小白兔、小猴子。我也曾有过委屈、有过埋怨，但这一切都敌不过站在你面前的那些可爱的小观众。我从心底里喜爱儿童戏剧这份事业，我为她奋斗终身！如今我虽然已退休十几年，但从未间断过这项事业，国际少年儿童节、宋庆龄学校艺术节、电视芝麻街、动画片译音……到处还有我的身影。

如今新的儿童剧场又要和小观众们见面了！在有生之年还能进入儿艺自己的剧场去看看孩子们，去看看如今战斗在儿童剧舞台上的新朋友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

明日请读一篇《巴金请人带口信》。

我与儿童剧场

我与儿童剧场

我是什么地方人

任雪蕊

小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，广东出了孙中山等革命人物，出了十九路军这样一支抗日英雄部队，实在了不起。再加上“食在广州”，我怎么能不为之自豪呢？

不过如今有种新说法，说生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人。那么，1923年5月我生在上海虹口闵行路，我就应该是上海人了。虽然我的家是广东人家，但四周都是上海人，我的邻居玩伴是上海人，说的是上海话。我五岁回广州，但抗战一开始我就回到上海，在上海读中学，读大学，参加工作，一直生活到今天，我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上海人，我的妻子是上海人，子女跟我只说上海话。有一次我回广州，跟女儿说上海话，但用广州话给女儿买甘蔗，卖甘蔗的老太太说：“真睇唔出，你呢位

家乡拜祭的老祖宗，正是这些南宋从金华逃难到那里的人。那么我的祖宗是浙江金华人，我的祖籍也就是浙江金华了。从此我碰到金华人就说自己的祖籍是金华。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，因为金华太有名了。金华火腿无人不晓，我小时候生病，要吃广东人怕吃的白粥，家里就让

的武夷山的饭菜明显没有泰宁

的好吃，为什么很现代化的武夷山县城的环境没有小小的泰宁城干净？

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泰宁闭塞，但有历史，文化底蕴丰厚，看上去那里的物质生活不如武夷山，但实际上泰宁人的生活观念远比武夷山高。武夷山原先是一个蛮荒之地，无历史可言，是搞旅游才开发出来的。

最让人遗憾的是，武夷山地处山区，缺乏平地，竟然修建6车道宽阔的马路，连同飞机场，那要开辟用掉多少个山头和水田？我1984年去的时候，只见绿山溪水、水田农舍，道路都是窄窄的，唯有一家度假旅馆。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，只能走，而且只有山道或田埂。

那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武夷山，跟上海这个大都市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武夷山。如果武夷山“建设”得跟上海一样了，还去武夷山干什么？

有人曾经这么说过：旅游应该包含一个深刻的、对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，是一种自我反省，用异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中应该反省的东西。

人不可能不主观，旅游能让人慢慢修正偏见。

去柬埔寨。游客看到当地人的家吓一大跳，什么都没有叫“家徒四壁”，可是，柬埔寨人连壁都没有。也许你感觉自己比柬埔寨人富有。可是，看到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，在河里莲花当中泼水唱歌，游客觉得这些柬埔寨人比自己富裕太多了。

旅游不只是看，要对比，检讨和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，找到内在的最美好的东西。不仅向外观察，还要向内反省。

而尊重旅游地原有的一切则是最起码的。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